

“近平同志为福州百姓花了很多心血”——习近平在福州（四）



采访对象：赵守箴，1940年1月生，福建古田人。1991年1月任福州市委副书记，1993年2月兼任市政协主席，1996年4月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2006年2月退休。

采访组：邱然 黄珊 陈思

采访日期：2017年6月4日

采访地点：福州市芳沁园

采访组：赵守箴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书记期间，您曾与他搭过几年班子。请您谈谈初次接触他的情况。

赵守箴：1991年之前，我一直都在省里工作。在省里的时候，我就听说过习近平同志，知道他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年轻干部。起初他在厦门任职，很多人都说他表现突出，很有人格魅力，在干部群众中的影响力很大。

1991年1月，我被任命为福州市委副书记，和习近平同志搭班子。由于之前听说过关于他的一些消息，知道他是一位好领导，心里十分高兴。省委组织部的同志带我到福州市委报到，还带我见了习近平同志。毕竟是刚到新的工作岗位，又要接触新领导，我的心情有些紧张。见面之后，他和我简单谈了几句话，很随和，很亲切，让我放下了心理负担。接着，习近平同志召开市委常委，他在会上来对我来福州任职表示欢迎，会场气氛很融洽。我记得，他在会上提出，班子里面要相互监督、相互提醒，团结一致把事情办好。会议的内容非常简单，习近平同志交给我一个分工：“今天先给你分一个工——管档案。你先分管这些事，其他的以后再说。”第一次见面就这么简单。

采访组：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您对习近平同志逐渐熟悉了，他给您留下了哪些深刻印象？

赵守箴：习近平同志做工作循序渐进，作风民主。慢慢熟悉情况之后，他给我增加一些分工，开始是改革工作，过了一段时间，增加了科教文卫工作，后来又增加了城建城管工作。所有的工作我都欣然接受了，唯独城建工作不敢接受。他的办公室就在我隔壁，我到他办公室主动对他说：“您和市长都在抓城建，我再进去管，就是三套马车啦。”他想了一下，说：“你讲的有道理。”就没有让我接手这个工作。

我对习近平同志的印象是在日常工作中逐步形成的。他对工作非常认真、负责，对同志非常热情、真诚，实事求是，事情该怎样就怎样，绝不掺杂主观感情。这一点非常可贵。随着时间推移，我逐渐加深了对他的了解，形成了几点认识。

第一点是他公事公办，坚持原则。事情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不管谁决定的，敢顶敢说，不会受制于周围的各种关系。我当时就感觉，他非常有主见，能秉公办事，能主持

大局，不受外界因素羁绊，不会受制于人。

第二点是他非常关心老干部。老干部的生活和福利待遇问题，他时刻都记挂着。当时福州有很多老领导在“文革”期间被安排到企业工作，这些人退下来之后，工资关系都在企业，各种待遇都享受不到。老干局提出这个问题后，习近平同志很有魄力，做了一个决定，把全市在企业离休的干部的工资关系转到市经济委员会，由企业转为行政部门，大大提高了这批老干部的待遇。

此外，他还在工作上关心老干部，建立关心老干部的具体制度，注意发挥老干部的作用，不让老干部感觉“人走茶凉”。比如，他开创了“老干部季谈会”制度，让老干部每个季度聚在一起召开会议。他说，老干部当过福州市的领导，跟其他人的情况不一样，思考问题比较深刻，现在退休了，了解老百姓的情况更多了，可以为市委建言献策。每一次“老干部季谈会”，他都亲自参加，悉心听取意见，了解情况。

第三点是他始终把群众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当时的福州，老百姓生活有很多困难。我刚到市委上班不久，平潭反映一个问题，说当地渔业资源枯竭，渔民打不到鱼，揭不开锅。他知道以后，就对我说：“你下去看一看，了解一下情况。”我到了老百姓家里，打开锅盖，都是野菜，吃饭都很困难了。我回来向他汇报了实际情况，他马上召集民政等有关部门，拨了60多万斤粮食给平潭，不让老百姓饿肚子。

采访组：根据您的了解的情况，您认为习近平同志在工作方法上有哪些独到之处？

赵守箴：第一个突出特点是，他能抓住事情的根本，化被动为主动。当时，“文革”中遗留下来的一些老百姓的案件还没有完全解决，上访群众很多。他针对这种情况提出，解决群众的困难，就不应该让群众到处找人，要改变工作作风，把“群众上访”改为“干部下访”。每个月，他都带一班人，到区县、乡镇专门去接待群众，每一次都解决一些特殊问题。我记得当时有一个问题，就是“文革”中有很多人的户口被弄没了，也不知道找哪个部门，就到处反映，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最后，这个问题在“下访”中得到了解决。

我有时候也跟着他一起“下访”接待。他工作很深入，每次都能让群众得到满意的

答复，群众特别欢迎，每次场面都很热烈。

第二个突出特点是讲究效率，讲究实效。他提出“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工作要求，被大家称为“马真精神”。他提出“马真精神”的时候，我还没来福州市委工作。当时是部队面临一些困难，一件事情很久没有得到解决，习近平同志听说后就抓紧落实解决了。这个事情解决后，他对部队官兵说：“你们有什么事情，提出来，找我，我马上就办。”由于当时这个事情解决得很好，官兵们听了这句话很受鼓舞，“马上就办”这4个字就广泛流传开了。

“马上就办”解决了速度的问题，而“真抓实干”解决了实效的问题。“真抓实干”的提出主要是针对当时繁琐的办事手续。那个时候，开发商办好一套手续要跑很多部门，盖很多公章。台商、外商开办企业要经过层层审批，手续繁琐。习近平同志了解到这种情况，专门在一栋楼里办了一个服务中心，让各个行政部门在楼里设服务窗口，人们要办手续就到这个服务中心来，足不出楼就能“一条龙”办好事情，节约了很多时间，大大提高了工作实效。

第三个突出特点是关心下属，很有人情味。他工作那么忙，却不曾忘记对我们的关心。每年，他都会把市委班子成员的家属请来，彭丽媛老师也参加，大家一起座谈，聊聊天，互相帮助，增进友谊，完全不是冷冰冰的上下级关系，而是好朋友、好邻居。

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大家给他过生日。他通知我们：“今天我过生日，大家一起到家里来吃饭。”我们几个人很高兴，下班后就到他家里去了。没有带礼物，也没有唱生日歌，很简单，也很随意，就我们班子里的几个人拉拉家常，聊聊天，非常开心。那天是彭丽媛老师下厨，都是家常菜，一碗一碗地端出来，味道很好。

整个班子在他的带领下非常团结，就像一个大家庭，彼此结下了深厚的同志友谊。他经常讲：“我们既是同事，也是朋友。”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和大家相处的。

第四个突出特点是讲纪律，讲规矩。他要求十分严格，错了就是错了，绝不会让步，也绝不会姑息。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一直关心群众生活，他在福州期间为改善民生做了哪些工作？

赵守箴：习近平同志做了很多改善民生

的事情，为提高福州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品质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任期间，虽然面临很多治理难题，却都能一一解决。

第一个是交通问题。当时福州市交通拥堵，管理混乱。小摊小贩占据在人行道上。出租车不遵守交通规则，乱停、乱调头，到处乱跑。残疾人开着小机动车乱搭乱载。整个城市交通毫无秩序，拥堵不堪。

第二个是内涝问题。福州雨水多，一下雨就发洪水，整条路变成河流，内涝严重。最严重的地方是铜盘路，一下雨就变成了“铜盘河”。

第三个是污染问题。当时，福州市的垃圾场就在闽江边，不仅脏乱臭，而且是致病的污染源。内河污染非常严重，污水直接排入河中，河水臭不可闻。

第四个是电力不足。当时工厂用电严重不足，“停三开四”，意思是三天停电，四天供电。工厂经常给市里打电话要电。

第五个是运输问题。道路建设不够，运输能力偏低。当时，我们从福州到厦门，路上坑坑洼洼根本走不动，还要堵一两个小时的车，走一天的时间。原材料输入、产品输出都不通畅。

这些问题，都是关系民生的大事情。在习近平同志手上，都逐步得到了解决。

在解决交通问题上，规范管理，严格治理。我到市委工作之后，他让我跟交通部门好好研究治理一下交通问题。他带领我们制定了7个管理文件，针对存在的问题一一作出规定。主要包括：不准在人行道上摆摊卖菜，成立执法队，上街执法；强化对出租车的管理，严禁乱停乱跑乱调头；不准残疾人搞运输，实在由于身体残疾不能从事正常工作的，由政府分配公益性工作或者发放生活补助。经过综合整治，交通问题有了很大好转。

在解决内涝问题上，因地制宜，开挖河道，让洪水及时排出。比如，铜盘路附近挖开了一条河，直接跟西湖连起来，洪水很快就能排到西湖里，避免内涝灾害。

在解决污染问题上，搬走垃圾场，兴建污水处理厂。习近平同志四处选址，最后在红庙岭找到一个地方，把那里封闭好，再把垃圾场搬到那里，做好垃圾处理，防止垃圾污染影响市民生活。原来的垃圾场由于污染太久了，周围的水都是臭的，基本上没办法开发利用了。习近平同志想到了一个主意，他找人联系到一个泰国商人，在垃圾场旧址建了一个鳄鱼公园，鳄鱼不但怕脏，还要吃脏东西，很快就生存下来了。就垃圾场的处理来看，习近平同志头脑非常灵活，能够化腐朽为神奇。在治理内河污染方面，习近平同志开了先河，在他手上建了第一个污水处理厂。当时，福州市财政并不宽裕，建污水处理厂要花很多钱，他硬是挤出来一部分钱建污水处理厂，足见他对内河治理的重视。

在解决供电问题上，全力协调。为了解决工厂用电问题，我们每个月都要跑到电力局、电力所跟他们打交道。真没有别的办法，电不够用，需要他们调节。习近平同志还亲自去电厂要过电，还在长乐建了汽油发电厂，以解燃眉之急。

在解决运输问题上，建设文明路、高速公路、飞机场。习近平同志支持开通文明路，加宽和疏通道路。后来，又修建了高速公路。

路，大大提高了公路运输能力。福州市的飞机场是在他手上建起来的。为了建机场，他专门成立领导小组，亲自到各处筹款。机场建成之后，大大提高了航空运输能力。

从上面这几件事情，不难看到，他来福州当书记的确不容易，遇到很多难题，而且每一件都很难办。为了福州百姓，他花了很多心血，想了很多办法，每一件都有交代。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人才，也非常重视干部队伍建设。请您谈谈他指导干部队伍建设的具体情况。

赵守箴：在干部队伍建设方面，他有自己的体系和观点。他不仅爱才、惜才，而且在选才、用才方面有独特之处。

在选才方面，他要求德才兼备，反对“唯文凭论”“唯分數论”。当时，在干部选拔方面有一个常见观点：要大胆用干部，特别要大胆用有争议、有能力的干部。习近平同志不赞成这个观点。他认为，有争议就说明毛病多，有能力未必有道德，干部一定要德才兼备才行。他常说，文凭只能代表考试能力，反映一个人受教育的情况，不能全面反映一个人的实际工作能力。有的基层干部，工作干得很好，应该得到提拔。他还说，公开招聘中考分高而实际工作搞得不怎么样的人，大有人在，甚至有的人为了得到更好的职位，平时不认真工作，一心复习应考，甚至请假复习考试，这样的人不能重用。

他关心干部成长，给干部解决工作困难。他一旦用人，就会对人充分信任，“用人不疑”。我印象最深的一条，就是他在用人时能帮扶干部，为干部成长提供支持，而不是只用人不帮人，不是那种布置完任务就只看结果，其他什么都不管，都让下面的人自己去解决。用通俗一点儿的话说，他不做“甩手掌柜”。比如，他每个月都要到区、县帮助当地干部解决问题。在下去之前，他先让市委办公厅通知区、县领导问清楚他们认为最难办的问题。了解情况之后，他就带着相关部门领导深入实地调研，召开现场办公会，根据当地干部反映的实际困难一一解决。我曾跟着他到下面参加现场办公会，遇到的难题多种多样，有的是贷款难，有的是缺人才，有的是手续办不下来，都是实际困难。习近平同志听了之后，还会到现场看，找出问题的症结，然后组织力量解决问题。现场解决问题后，还建立检查责任制，监督和追踪问题的解决过程，让问题尽快彻底得到解决。他在这方面做得很到位、很细致。更可贵的是，他每年都坚持这样做，每年都做几次，很扎实。

在用人上，他不太赞成组织部临时考核干部。他认为干部要在平常考核，一年搞两次考核，中间一次，年末一次，主要考核实际工作能力和任务完成情况。不要等准备提拔时再临时考核，一是原来就对干部不了解，临时抱佛脚，很难了解真实、全面的情况；二是正式的任命文件还没下来，社会上就先传开了，某某在接受考核，很快就要提拔了，影响不太好，也让后面的工作变得被动。

他一旦看准要重用的干部，就十分信任，给大家施展才华的机会，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他一开始让我分管干部工作，就跟我说，要让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很有希望，不要厚此薄彼；还要适才而用，根据每个人的长处提供施展才华的平台。

（上接1版）归根到底，就是要把坚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有机结合起来，不可偏废。“始终准确把握‘一国’和‘两制’的关系。‘一国’是根，根深才能叶茂；‘一国’是本，本固才能枝荣。”“在‘一国’的基础之上，‘两制’的关系应该也完全可以做到和谐相处、相互促进。”《决定》也强调：“必须坚持‘一国’是实行‘两制’的前提和基础，‘两制’从属和派生于‘一国’并统一于‘一国’之内。”只有这样，“一国两制”的航船才能劈波斩浪，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健全中央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行使全面管治权的制度

作为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一国两制”在香港、澳门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特别是在当前更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牢牢掌握宪法和基本法赋予的中央对香港、澳门的全面管治权。《决定》指出：要“健全中央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对特别行政区

行使全面管治权的制度”。这包括：中央对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的任免制度和机制、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解释制度、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对中央政府负责的制度、香港和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制度、宪法和基本法等国情教育制度、防范和遏制外部势力进行破坏活动的制度等等，以确保香港、澳门的长治久安。

我国是单一制国家，中央对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在内的所有地方行政区域拥有全面管治权。必须把维护中央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任何时候都不能偏废。邓小平曾经尖锐地指出，中央必须保留一些权力和在必要时进行干预：“如果中央把什么权力都放弃了，就可能会出现一些混乱，损害香港的利益。”“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就万事大吉了……难道香港就不会出现损害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能够设想香港就没有干扰，没有破坏力量吗？我看没有这种自我安慰的根据。”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

的制度建设方面形成了许多新成果，如2014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确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的基本制度、2016年11月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公职人员宣誓制度作出解释、澳门特别行政区完成了国歌法本地立法，设立了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等，在制度建设上取得重大进展。我们要坚持“一国两制”方针不改变、不动摇，既要把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地建设好，也要把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澳门建设好。只要我们全面准确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齐心协力、团结奋斗，就一定能够开创香港、澳门更加美好的明天。

坚定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推动两岸就和平发展达成制度性安排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愿望，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所在。对于统一问题，邓小平曾指出：“这首先

是个民族问题，民族的感情问题。凡是中华民族子孙，都希望中国能统一，分裂状况是违背民族意志的。其次，只要台湾不同大陆统一，台湾的地位，台湾作为中国领地的地位是不肯定的，不知道哪一天又被别人拿去了。第三点理由，是我们采取‘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统一问题。”

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始终把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作为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实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构想方面有不断完善的顶层设计和艰苦努力的实践探索。2019年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紀念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全面阐述立足新时代、在民族复兴伟大征程中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五项重大政策主张，其中之一就是提出要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丰富和平统一实践，这让“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顶层设计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

在实践探索方面，两岸实现了全面直接双向“三通”，双方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达成“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努力谋求国家

统一”的“九二共识”。2005年4月29日，胡锦涛在北京同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举行正式会谈，这是60年来国共两党主要领导人首次会谈。2015年11月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台湾方面领导人马英九在新加坡会晤，这是1949年以来两岸领导人首次会晤，开创两岸领导人直接对话沟通的先河。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的重要体现是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不断积极推进，两岸共同市场不断发展壮大。2008年以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签署了23项相关协议。但2016年民进党上台以来，不承认“九二共识”，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础，使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化进程遭到破坏，台湾民众的利益福祉受到损害，两岸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合作受到影响。《决定》指出，要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共同反对“台独”、促进统一。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保障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推动两岸就和平发展达成制度性安排。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三编研部副主任、研究员）